

“过渡时代”的巨人

□柳雨灯

“过渡时代”是梁启超提出的概念。自第一次鸦片战争“西人之入中国，实开千年未创之局”(丁日昌)。对于这个“千古变局”，鼓吹变法图强的梁启超作《过渡时代论》欢呼道：“过渡时代者，希望之涌泉也，人间世所最难遇而可贵者也。有进步则有过渡，无过渡亦无进步……故过渡时代者，实千古英雄豪杰之舞台也！多少民族由死而生，由剥而复，由奴而主，由瘠而肥，所必由之也。美哉过渡时代乎！”按照梁启超的这种说法，中国至今仍处于“过渡时代”，即处于“现代化”的进程中。若以终结停滞的专制帝国而建立没有“皇上”的共和国为一里程碑，则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成功，可以称之为“过渡时代”。

那么，谁是与这一个雨横风狂时代相始终的巨人呢？政治人物曾国藩、李鸿章、张之洞或孙中山、黄兴？知识精英康有为、梁启超、严复？这些人且不论精神文化上的“境界”有无达到，时空上就是或早或晚。当得起这一美誉的似乎只有一个人：容闳。

我知道，这样讲很多人是不认同的。记得韩国总统卢武铉在北京一家大学发表演讲时，曾推心置腹地说：我最敬佩的韩国的政治人物是金九，他是韩国民主化的先驱，是一个没有看到成功的英雄，而人们总是仰慕成功人物的，所以我向青年推荐的榜样是美国总统林肯。他的这番话是深谙大众心理的。容闳显然不是一个“成功”人物，既

没有取得显赫一时的权势,也没有什么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。

对于他的成就,人们只知道,他是美国耶鲁大学建校以来接受的第一位中国籍学生,是第一个受过完整的西方教育并取得学位的中国人;对于他的“事功”,人们只知道他促成曾国藩向清廷提出了派遣幼童赴美留学的计划。了解得多一些的,知道他选携留美的幼童,后来有不少成长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栋梁,如被誉为“中国铁路之父”的工程师詹天佑、中华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、中国邮电事业的奠基人朱宝奎等等。

其实,容闳的“事功”还有许多。他曾为曾国藩创办“江南制造总局”到美国采购机器;曾在上海发起筹建“华商轮船公司”;曾在上海与广东香山同乡出版第一份由中国人创办的华文报纸《汇报》;曾赴秘鲁暗访华工受虐待的状况,以摄影等证据与秘鲁政府代表交涉,为中国政府开创了保护侨民的先例,在中秘条约的正式互换过程中,使中国政府第一次在外交上取得胜利;戊戌变法“酝酿及进行时,他在北京的寓所是维新派骨干的聚议之处;有一段时间他也曾把主要精力放在“实业救国”上,以西方管理模式筹划办银行、修铁路的计划;庚子之变后,他将主要精力放在政治方面,于1900年联合康梁保皇派、孙中山革命派与唐才常的“自立军”,成立“中国国会”,当选为会长;1900年底被清廷列为“要匪”遭通缉后,在旅居美国的最后十年,无日不关注着中国的政治局势……

如果我们跳出以成败论英雄的旧框框,“追踪”容闳一生的思想足迹,对于他的人格魅力不能不产生一种高山仰止的激赏。

那么,容闳的精神文化遗产究竟是什么呢?

容闳青年时代说过一句话:“以西方之学术,灌输于中国,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。”这句话是“西学东渐”命名的由来,也确是理解容闳精神世界的一把钥匙。

理解这句话有三点值得注意：

一是容闳心中的“西方之学术”，绝非洋务派想选择性“拿来”的“西学”——只可以作“中学”的补充而为天朝所用，不能触动天朝的专制之“体”。他想“灌输于中国”的不仅是制造机器、修建铁路等科学技术知识，还有自由、民主、平等等18世纪以来西方进步的人文与政治思想。正是由于有这样一个根本的歧异，充当“出洋肄业局”正委员的翰林学士陈兰彬及后任肄业局总办翰林吴子登，才露出叶公好龙的本相，撺掇清廷撤销肄业局，逼留美学生统通归国而始安。在容闳看来，留美幼童有“自由之精神与活泼之思想”是十分自然的事，而在陈、吴看来，学生们受美国人同化渐改故态，不复规行矩步低眉顺眼，见了官长居然不愿行跪拜礼，简直大逆不道，让他们留学不过是为外国增加几个洋人罢了，回国则只能添乱，何须浪费朝廷银两？继承曾国藩衣钵、支持幼童留学的李鸿章，之所以同意拔除“曾文正公手植桃李”，重要原因之一也是认为容闳不识“大体”。

第二，容闳终其一生固然十分看重自己创办的留学教育事业，他的主要成果也表现在教育方面，但他心中要“灌输于中国”的“西方之学术”绝不限于教育领域。他所草拟的轮船公司章程、银行与铁路实业计划、为两江总督张之洞提出的“新政策”，乃至20世纪初他牵头成立的“中国国会”，去世前两年帮助孙中山制定推翻清王朝的“中国红龙计划”，无不贯通着“西方之学术”的血脉。

第三，容闳无疑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，同时也是一个伟大的世界主义者。“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”是他终身为之奋斗的目标。欣闻武昌起义推翻了满清王朝，风烛残年的老人满怀激情地写下了《给新中国领导人的信》，欢呼“中国人民正处于自己主权的最高峰”，提醒革命党人不要相信“叛徒”袁世凯和“他的喉舌唐绍仪”，警惕“陷入内部争执和内战的深渊”；“导致外国干涉”；并在稍后致孙中山的信

中表示很想到祖国“参观参观这个新共和国”。但是,我们不能忘了,他是一个具有救世情怀的基督徒,他还是一个美国公民,曾主动要求服役参加林肯领导的北军,尽管在美国的排华浪潮中他的公民资格不再被承认。作为一个伟大的世界主义者,用他晚年投身中国政治变革时的话说,他的宏愿是:“变旧中国为新中国,变苦境为乐境,不特为中国造福,且为地球造福。”

容闳是一个崇高的理想主义者,又是一个坚忍不拔的现实主义者。他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南屏村的一个贫寒农家,母亲原本是为了让儿子长大后有口饭吃,才忍泪让7岁稚龄的他到澳门入洋人学堂的。待到心智一开,他心心念念想的就是为中国为世界的文明富强干一番事业,从未追求升官发财光宗耀祖。从耶鲁大学毕业归国后一年里换了三次职业,他毅然放弃了在上海的海关担任头等通事月薪200两白银的职位,因为他不愿同流合污,因为他不屑放弃做人的尊严“作为一个动物性存在而服役”。然而,这并不妨碍他对现实持有清醒的认识,并为实现宏大理想而脚踏实地不避艰险去奋斗。回国后的经历使他痛切地感到太平天国起义爆发的“恶根实种于满洲政府之政治,最大真因为行政机关之腐败,政以贿成……官吏既人人欲饱其贪囊,遂日以愚弄人民为能事,于是所谓政府者,乃完全成一极大之欺诈机关矣”。由于对满清政府这一“欺诈机关”的厌恶,他曾深入太平军占领区去考察,赴“天京”造访总理朝政的干王、老友洪仁玕,并对他提出振兴太平天国、改造中国的七点方案。不过,他“收获”的只是一个“义”字爵的空衔和“石头碰棉花”似的失望。否弃太平天国之后,他选择经商贸易,希望借此积聚雄厚的财力,为实现自己的政治文化理想奠定物质基础。再以后,他一直是“坚挺起理想之矛,左冲右突,屡踣屡起,绝不气馁,在铁幕中国留下一串串探索者的脚踪”。

(林 飞摘自《南方周末》)